

察界

THE OBSERVER

備主編 平安

第十五卷



期五十

和真比戰難麼？
貧窮與貧窮問題

專論

討

「生產因素四分法」與革命

關於傳統經濟學的總答辯

冀東風雲（天津通訊）

華北山雨欲來（北平通訊）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特約記者
譚崇台
樊弘
劉大杰
董時進

幣文藝

邵燕祥

和真比戰難麼？

董時進

報載胡適之先生在北平講演，認為中國的局勢「和比戰難，要難上千倍萬倍，而和中共談和平，根本是妄想。」這些話使一般渴望和平的老百姓見了，感覺十分掃興與失望。打仗要動員無量數人力物力，犧牲生命財產，應該是最繁重，最困難的，所以說兵凶戰危，任何國家非到萬不得已，決不肯輕易打仗。至於和，乃是戰之反，是消極的，只要不打便是和。不打，應該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情，何以反而是最困難的？假使說和平的實現，真有困難，也不過是因為雙方的首領互不許讓步，但是，只要有一方面肯作比較重大的讓步，和平也沒有不能實現的道理。

胡先生認為與中共談和平根本是妄想，這不啻首先關上和談之門，而與一般人認為中國的戰事任何一方面也不能殲滅對方，而最後必是一個和談結局的意見恰正相反。胡先生大致是認為政府早晚必可以平服中共。但這究竟要等待何年何月，以及最後到底能否辦到，恐怕一般人民很少與胡先生有同樣的信心。就過去的事實而論，以往和談之所以卒不成功，並不能歸罪於中共一方面，這是一般人的公論。因此，我們實不能開首就一口咬定，和平根本不可能。

胡先生一方面認為和平萬不可能，一方面似乎也承認戰事亦不能解決目前的困難，所以主張「只有苦撐待變」。他說：「所謂待變，不一定要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只要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民主自由和平的生活方式）有信心，能擋住，那麼，半年一年之後，大局不會沒有轉變。」不知道胡先生所期待的轉變，究竟是什麼樣的轉變，除了外援和第三次大戰之外，不知尚可能發生什麼奇蹟。胡先生說「不一定要爆發第三次大戰，一可見第三次大戰也是他所期待的轉變的一種，這是一種很危險的期待，我們都祝禱它不要爆發。

假使再苦撐半年一年之後，大局依舊沒有轉變，或變得更壞，又將如何？胡先生有何把握，能担保將來的轉變一定有利於我們？

依據我過去所得到的印象，胡先生對於時局的觀察，與嗣後表現出來的事實大有出入。記得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前的那幾年當中，全國人士痛恨日本步步侵掠，多認為非拚死抵抗不可，胡先生便是當時反戰最力的一個人。他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同日本打，他說我們要度德量力，知已知彼，只有忍耐，等待五十年之後再說。想不到仗畢竟打了，而且勝利竟歸了中國。在民國二十二年春，我在《天津大公報》發表上一篇主戰的文章，胡先生即在他所主辦的《獨立評論》上把我的文章痛斥了一翻。我並非要同胡先生算舊帳，不過他那篇反戰的文章恰與這次反和的講詞相反，所以不能不令人要想引用一下。他在那篇文章裏面曾說，他不能昧着他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

利用百姓的弱點，一使軍閥慣用的手段，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的百姓好對付，我們反正我們的百姓。我的文章上有這樣幾句憤慨的話：「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上前線去死，盡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

胡先生說他的良心決不能容許他說這樣的話，他說他「讀了這種議論，真很生氣」。接着他問道：「董先生說的『我們』究竟是誰？董先生是不是『我們』的一個？『他們』又是誰？」董先生又是不是「他們」的一個？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着無數的「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決不願學着這種壯語主張作戰！」

對於他的這些問題，當時我曾經有答復，不在話下。不過現時再談胡先生的這幾句話，不能不有一些感慨。不知道胡先生是否認為現在的作戰，也是「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着無數的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不知道他是否仍願說，情願亡國，不願主戰的話。

他又說：「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

雖然後來的事實證明了胡先生當時不會把事情看準確，不過他的用心和上述的幾句話是善良的。他不願意着良心去主戰，主張處處存哀矜，這不能不說是仁者的用心。胡先生應該將那種哀矜之心拿在現時來應用。目前的戰事，不但已經進行了很久，而且規模是驚人的大，也是空前的慘酷。據政府派往徐州一帶視察戰事的鄧文儀所發表的談話，也說抗日戰事也從來沒有這樣大的場面。被飛機轟炸起火的村莊，烟霧瀰漫的照片，印在報紙上，使人見了心驚胆寒，不勝浩嘆。試閉目一思，那周圍至少數百方里的人民，以及全國各戰區無數的人民，流離失所，受飢受寒，房屋被燒了，父母兒女被打死了，或者鼓着眼睛看見他們的房子在燃燒，看見他們的父母兒女的血肉橫飛，我們應不難明白，為什麼一般人民不能跟着胡先生「苦撐待變」。這般人民根本沒有生活，從何說得上什麼生活方式，及民主自由，更何能對於他們的生活方式有信心。胡先生既顧念幾千萬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現在正是拿出哀矜之心為他們謀幸福與除痛苦的時候。

一般人民沒有願意戰的，將士願意打仗的恐怕也很少，士兵氣民心鼓動不起來，就是這個緣故。極少數人硬要驅使着，拖着這許多人去打仗，哪能不是一件難事？但是我敢說，只要一聲和平出來，全國人民都一定會歡欣鼓舞的迎接，不用政府發命令，到處都會懸旗放鞭炮。戰是難的，越打越難，和是容易的，比戰容易到千倍萬倍。至於和平以後的問題，以及生活的方式等，自須求得解決，不過這一切相信是終究可以解決的，並且相信以和平的方法求解決，比較以槍炮求解決容易得多，而且比較一於我們有利。在和平的社會上，大家動口不動手的環境中，任何人也不能強使全中國人民奉行他們所不信仰的生活方式。

貧窮與貧窮問題

全 慰 天

配現象，再加上遺產原則的推波助瀾，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演成了嚴重的貧窮問題。

貧窮與貧窮問題在概念上應當是有分別的。人類生活必須進行在羣體中，如果羣體中每個人都吃不飽，穿不暖，在飢餓線上苟延生命，而沒有一人例外，那是貧窮。貧窮是羣體所共同的。貧窮問題則不然。在羣體中大多數人陷於貧困時，它允許有人享受特殊的生活，不受飢餓，也不受寒冷。古詩「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滿街衣羅者，不是養蠶人」，所描寫的不是貧窮，而是貧窮問題。貧窮原於生產力的不夠，只存在於人與物的關係上，而貧窮問題則發生於財富分配的不均，不僅存在於人與物的關係上，還連帶存在於人與人的關係上，可能更偏重於後者。

我們如果視羣體為一個單位或整體，以全人口數量除全年收入或生產總額，所得的商數，即足以表示這一羣體絕對的貧窮程度。如果單着眼於這一羣體內的貧富距離，在財富分配的比較上，從上層階級全年收入的平均數中減去下層階級全年收入的平均數，所得的差數，便是其相對的貧窮，或貧窮問題嚴重性的指標。

二

絕對的貧窮，與一個羣體中的人口數量，其所佔有的土地面積，或嚴格說，可稱地面積，以及其已具備的文化程度或即生產技術，都有極密切的關係。英儒馬爾薩斯的學說，千言萬語一句話，就是「人口數量過多，必然招致貧窮與罪惡」。由於土地報酬遞減律的限制，可耕地面積的大小與貧窮有着反比例的關係。生產技術的改善，無疑可以減低貧窮的威脅；近年國內許多人士提倡工業化的主要用意在此。總之，土地面積與生產技術決定了這一羣體的財富總生產量，而人口數量則密切影響到財富的總消費量。總生產量與消費量的平衡，除了儲蓄或再生產，最後主要係於一般生活程度的高低。由於物力有限而人欲無窮，此種生活程度就可以說是這一羣體的貧窮程度。

但貧窮問題雖與人口數量、土地面積與生產技術不無關係，而這關係至多是間接的，有時甚至是殊可不必的。此三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是這一羣體共同財富的多少或「人與物」關係上的一般比例，並不一定影響到複雜的「人與物與人」的關係上的實際分配。由此可見，貧窮問題的發結是另有一工的。

貧窮問題的存在有它更深一層的道理。假如一切人類生活所需要的物質，有如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取用不盡，人們不工作而自然吃得飽飽的，穿得暖暖的，那不是適於貧窮問題存在的景況。不幸「樹上掛着葡萄，河裏流着生奶」的伊登樂園，迄今還不會，也許永遠不可能，在地球上實現。在此種沒有「無底匱乏」的情況下，由於人都有好逸惡勞的本性，希望工作得少而享受得多，又由於人與人之間沒有神經的連繫，各自苦樂可以不盡相同，所以社會中各個人的生物基本需要，必然只有從不平均的財富分配上求得一己的滿足。而財富分配息息相關的是工資、地租利息及利潤等因素。固然個人的才能、職業與機遇的不同，也影響到財富不同的分配，但在分配過程中無論如何須通過這四道締門。尤其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會如此。通過它們而出現的財富不平均的分

三

上述只是貧窮與貧窮問題的一般理論的比較分析。如果再從社會演化的事實中來說明二者的分別，也許更能對於上述意見有一個明確的概念。

原始社會中，由於自然環境的限制與生產技術的不發達，無論如何免不了飢寒交迫的苦痛。現在東倫敦管民窟裏的貧窮程度，也較一般初民不知低下到幾千萬倍。初民固然不時也可獲取一個野豬或海象，大嚼一頓，但挨餓受凍的經驗總是相當普遍的。尤其在寒冬如此。愛斯基摩人為節省糧食，甚至常於搬家時令衰老父母留在原處，飢餓以死。這無疑是一個極端貧窮的局面。但在貧窮的背後却找不到貧窮問題的蹤影。初民原本不能生產多餘的糧食，有了也不知道妥善保存，以備不時之需。所以無論何人獵取一個大野獸，都得與大家在短期內把它吃完。財富公有，苦樂同當，或許是這時對每個人部比較有利的辦法。孔子所謂「人得之，人失之」的理論，多少反應了原始社會的需要。此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不可能有貧富距離，至少貧富距離不可能太大。貧窮問題在原始社會生不了根，雖然它是貧窮的。

等到由漁獵遊牧演化到農業階段之後，尤其是由長耒的鋤耕文化（hoe culture）進化到犁耕文化（plow culture）之後，由於獸力被使用到農業生產過程中，大大的提高了生產力，這時每一個人所能生產的糧食，除了滿足自己生物基本需要，剛好有些剩餘，可以被保存起來。這是職業分化、奴隸制度、私有財產、社會階級等現象出現於人類社會的關鍵。因為即使在犁耕文化階段，仍是一大不耕，或失之亂，一女不織，或失之寒」的局面。大家都必須附着在泥土上，工商等職業無法從農業中分化出來。財富無從累積，任何人卻不能剝削，也就不被剝削。戰爭掠奪必然只有殺死，蓄為奴隸，實在擇不出剩餘勞力來。因之社會階級的存在也落了空。基於此理，所以司馬遷所謂「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孟子所謂「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一類事實，必須要在犁耕文化基礎上才能發芽與生長。與這類事實連繫在一起的就是羣體內部相對的貧富距離，有人衣帛食肉，有人終年勞苦而不得一飽。總之，犁耕文化雖然一面減低了以往貧窮的程度，但另一面却是貧窮問題的起點。

如上述，犁耕文化階段雖已有貧窮問題的存在，但由於生產力不如今日發達，財富累積與貧富距離都受相當限制，所以貧窮問題也遠不如今日嚴重。並且此時農業生產過程主要進行在自然力量嚴格控制之下，人們要「靠天吃飯」，所以無形中迷信天命，認爲「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或者原於前生行為的善惡。由於農業人口安土重遷，文化交流不容易大量進行，社會很少變遷，故此種迷信心理經久而不易動搖。因之，這裏雖已有貧窮問題，但一般人並不一定意識到它；至少不容易意識到這是社會本身的問題，是由於人謀不臧所引起的問題。富人因迷信因緣果報的自私心理而推行的慈善救濟事業，結果也可使貧窮問題緩和下來。農業社會中的貧窮問題，大都如此被輕輕的按下不理罷了。

工業文化中利用無生能力所發動的機器，改變了以往「靠天吃饭」的局面，使人們從迷信天命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領悟到人的偉大，人力可以勝天工。這種心理與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機器生產情形下的貧富懸殊現象湊合在一起，於是使極嚴重的貧窮問題明朗化了。貧窮問題從此不再是天命的問題，也不全是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屬於社會本身的问题了。可是這時却並不比農業社會，尤其原始社會，貧窮。相反的，貧窮問題最嚴重的跡象，都見之於資本主義的後期，即在社會演化史上較以往最不貧窮的階段。一面會革命等事實的層出不窮。目的都無非在使有產者的貧富，通過政治的方式，多少轉入無產者的手中，期望減少或消弭當前嚴重的貧窮問題。

四

在貧窮與貧窮問題的比較和分別上，美國、蘇聯和中國各自的情形，正好代表了三種不同的型態。

先就美蘇情形比較說。美國久矣被譽為「黃金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不但沒有受到絲毫損失，而且反獲得了許多「漁人之利」，更加呈現一種特殊的繁榮景象。而蘇聯原本是一個生產比較落後的國家，幾次五年計劃的一點成績，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摧毀，迄今還未曾復原。因此，美蘇兩國貧窮程度的懸殊，由此可以想見。

可是在另一方面，最不貧窮的美國却是貧窮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從資本家到勞工階級的貧富距離，大到不能想像。Guther Stein¹¹ 在 The Spectator 上發表一篇「迷惘的美國」，認為美國「繁榮的背後，不是欣欣向榮的愉快和滿足，而是恐懼和不安」。因勞資爭議而引起的大罷工，更是常見於報章。而蘇聯雖然一般比較貧窮，但由於一

漢代末年的學生運動

劉大杰

這幾年來的學生運動，政府感着頭疼極了。政府用盡了各種力量來弭平學潮，都只是一種治標的方法，未必能有多大實際的效果。任何一種思潮一種運動的起來，都有時代的背景，都有政治社會的原因。在這一個經濟破產、社會腐爛、兵連禍結、民不聊生的時代，知識青年，發出不滿意於現狀的呼聲，對於政治有所責難，對於現實有改革的要求，這實在是表示時局動盪不安的信號。這一種情形，歷史上是常有的。近一點的五十四不用說，東漢末年北宋末年晚明時代和戊戌政變，青年學生都起過激烈的運動。每一時代的統治階級對於讀書人都採取高壓的政策，以大量的慘痛的屠殺，來毀滅他們的力量，結果是兩敗俱傷。但是後代讀歷史的人，對於那些手無寸鐵的莘莘學子的言行，無不加以讚歎與同情。為什麼到了歷史上便變成了正義與英烈，到了現實便成為醜惡與暴亂。是非曲直何如此之不分明，何如此之沒有標準。是統治者沒有進步，還是歷史沒有真理？我們只要把頭腦冷靜地想一想，便知道要弭平學潮，只有切實改善不良的環境，一個參考。

東漢末年的幾個皇帝，都是短命天子，繼位的人都是幼小的孩子，什麼事情也不懂

，一般人主要靠工資的勞務所得而生活，很少甚至沒有財產所得的存在，故其貧窮距離比起美國來，幾乎可以說是小到了等於零。至少在蘇聯沒有汽車大王、鋼鐵大王一類的百萬富翁。蘇聯沒有貧窮問題，無論就貧窮或貧窮問題任何一方面說，都是有病的。中國可至現在中國的情形，無論就貧窮或貧窮問題任何一方面說，都是有病的。中國可耕地面積有限，人口數量過多，而生產力又不發達，故命運已註定了是一個貧窮的社會。近年內戰蔓延，一面減低了原有生產力，一面對於已生產的財富又無情的毀於砲火，又大部掌握在少數豪門資本家的手中，而逼着大多數人民在死亡線上苟延生命。不合理，不人道，無有過於此者。中國的貧窮問題也許不比美國的不嚴重。所以很不幸的，中國人正面臨着雙重的災難，其建設工作也是加倍的艱鉅。

五

根據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論，貧窮問題無疑遠較貧窮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來得嚴重。在社會演化過程中的現階段尤其如此。貧窮令人「苦」，貧窮問題令人「悶」。就人類社會說，自然最好是既無貧窮，又無貧窮問題，既不「苦」，又不「悶」的局面。萬一不得已而求其次，應當是寧「苦」不「悶」。因為人只要不「悶」，「苦」亦不覺其「苦」了，至少「苦」不太關係要了。

免除貧窮是自然科學的責任，解決貧窮問題是社會科學的責任。由於自然科學的進一步，現社會比起原始社會來，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了貧窮，至少貧窮已不太嚴重。然而社會科學依然停留在中世紀的幼稚階段，以之來應付現代自然科學所引起的嚴重貧窮問題，却有如治絲愈紛。果真解決貧窮問題較免除貧窮更為當今急務，則主要工作無疑在於發展社會科學，並消除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間的不平衡。

，結果是太后聽政、外戚專權、宦官得勢。女人宦官和外戚的鬥爭與殘殺，演成了東漢末年亡國的歷史。自和帝連合宦官鄭崇，殺了專權的外戚竇憲兄弟，一直到獻帝時候袁紹帶兵進宮，那幾十年的政治，完全掌握在宦官們的手裏。中間雖也有外戚如梁冀竇武之流，想從宦官的手裏奪取政權，結果都是送了性命，一事無成。於是宦官的勢力日盛一日，在朝的封官賜爵，掌管朝政，在野的親屬兄弟，佈滿州縣，刮地皮、害百姓，奪婦女、殺善良。真是弄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關於他們的情形，史書上有不少的記載，我們今日讀了真是只有憤恨和歎息。試看後漢書的單超傳云：『單超，徐璜，具瑗，左闕，唐衡五人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闕耗，施於大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妻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兄弟姻戚，皆宰州郡。專較百姓，與盜賊無異。』這些宦官都是桓帝時候的寵臣，一旦得了勢掌握政權，便無惡不作，為所欲為。

我們再看侯覽的傳記：『侯覽奢侈晉縱，前後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破人居室，發掘墳墓，奪虧良人，刲略婦子。』這樣的兇惡奢淫，完全是盜賊行為。到了靈帝，更是貪廉鮮恥，叫宦官張讓作父親，李忠作母親。一點正事不作，一天

到晚鬧着四驅車馳騁郊外；有時候四園弄狗，同婦人飲宴取樂。又叫宮女在後宮開着小

店，販賣雜貨，與小民爭利，借着雜貨店的方便，正式定出價格來，賣官鬻爵。二千石的官價二千萬，四百石的官價四百萬，公一千萬，廁五百萬。積了錢都寄存到宦官家裏去。這樣的皇帝同那樣的宦官結合起來，政治上自然會產生出種種的混亂與罪惡，民眾自然會陷入痛苦無告的深淵。熱血青年的抗議與農民的暴動，自然會一觸即發了。

從西漢實行土地私有制度以來，於是貴族富豪收買土地，集中財產，小百姓的生計是日益窮困。王莽雖曾一度將土地收歸國有，限制資產，但他那種經濟政策隨着他的皇位完全失敗。到了東漢末年，貴族富豪的勢力愈形膨脹。他們都有廣闊的田地，壯麗的城堡和莊園，幾千幾百的奴婢，眷養無數的勇士和刺客，增厚他們的勢力。上可以抗拒朝廷的命令，下可以魚肉小民，劫奪婦女。小百姓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忍受那種無可形容的痛苦。仲長統在《理亂篇》中說：『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貿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牛馬羊，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娛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酌，敗而不可飲』。這正是當日社會中一幅貧富不均階級對立的圖畫。政治的黑暗是如彼，經濟的腐爛是如此。在這種嚴重的情形之下，叫小百姓在飢寒中過生活不許亂動，叫知識青年一聲不響俯首聽命，這自然是不可能的。雖說當日也有許多無恥的士大夫和那些唯利是圖的讀書人，羨慕那種有錢有勢的享樂生活，於是用欺詐用游說種種不顧名節廉恥的行為，去誦媚宦官巴結富豪，達到勢利的目的。『苟連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亂，路闊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耶？』仲長統這幾句話，把當日無恥的士大夫的臉孔，刻畫得那麼分明，真是沉痛到了極點。但這是善良的讀書人，前進的知識青年和庶民的小百姓，眼看着這種黑暗腐敗的政治，身受着官僚豪富的經濟壓迫，不能全無舉動，思想激烈情感狂熱的青年們，自然會發出反抗的言論與行動來，又漢大年有名的大學生運動，就在這種環境之下產生了。

關於他們科科活動的詳細史料，雖說被正統派的歷史家毀滅了，但我們從零細的記載裏，還可看出他們的宗旨和活動，他們是以三萬多個大學生爲主體，因爲再也不能容忍那種黑暗混亂的狀態，於是集體地向那些狐羣狗黨的宦官污吏，發出有力的攻擊，對正直的孤立無援的人，加以烈烈的擁護。這些正義的呼聲，果然造成堅強有力的輿論。

熱烈的擁護出來，成爲青年們的領袖。這三個人雖然官爵大小不等，但誅宦官殺土豪爲民謀害的思想是相同的。大學生因爲擁護他們，喊出口號來了，（這是中國最早的一句）『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暴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皮！』這口號雖是簡單，意義却是深遠。那就是說不畏強暴的可爲人民模範的人我們就擁護，否則就要反對。這樣一來

司馬光編完了這段悲痛的歷史的時候，曾感慨的說：『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廷，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

黨人於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

『他一面悲歎讀書人死得可憐，一面好像還在責備讀書人不識時務。以口舌同惡勢力鬥爭，其危險自然是等於撩虺頭踐虎尾，但讀書人也就正在要這種地方，才可表示勇氣與正義。司馬光這一種明哲保身、卑弱自守的觀念，實在是太消極了。難道東漢的亡，還要黨人負責嗎？這一次的學生運動，雖是失敗了，實在是中國知識份子偉大精神的表現，是爭自由爭正義反暴政反豪門的偉大精神的表現。這一次運動，是可歌可泣的！

歷史的事實，活躍的擺在我們的眼前。牠可以讓我們認識古人，也可以讓我們知道自己。牠是一面透明的鏡子。可惜今日居高位握大權的人們，不肯照一照這面鏡子。會讀歷史的人多，會用歷史的人少，這真是一種永恆的悲哀！

生產因素四分法一與革命

譚崇台

大文後，頗覺他對第一點的批評意有未盡，因寫此文，並向樊先生請教。

二

從技術的觀點去看人類的生產行為，我覺得生產因素四分法的本身並不承認階級革命觀念發展的過失。單純憑勞動，生產行為殆成爲不可想象的事。最原始形態的生產，也必需勞力與自然（土地）的結合，如要增大產量，則必賴中間貨財（intermediate goods）的出現，使生產過程拉長，從直接生產方式變爲間接的迂迴的生產方式；換言之，必須在勞動與自然之外，給生產行為加上另一個因素——資本。生產行程加長、生產規模加大的結果，勞動、自然與資本如何配合方能有最大的效率，生最豐美的成果一問題，給生產行爲帶來了一個新因素的需要，即是，要從事大規模的生產，除勞動、自然與資本之外，還需要一種特殊形態的勞動——管理。

照勞動價值學說，資本是過去的勞動所積成，因此資本也是勞動，不必獨成因素。但「死勞動」與活勞動畢竟有死活之分，我們如將「死勞動」定名爲資本，而此物又確爲生產行爲所必需，則名之爲要素也似無不可。至於生產行爲圓滿之後，純生產關係祇來自勞動，抑或資本、土地與管理也各有貢獻，早已成爲經濟學說上的爭論。但從事生產行爲時，技術上有一個確切不移的事實：即以同質同等的勞動從事生產，土地愈肥沃、資本越豐富、管理更進一步者所得的純生產量越大，因此即使否認資本土地等對純生產各有貢獻，也無法否認一個技術原則：要增大勞動的純生產力，必須以資本土地等因素量與質的增加爲要件。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下，中央設計機構不特要付給管理因素以「利潤」（採取薪津或俸祿的型態），而且爲了要把資源的分配達到最大利用的境界，還必須把資本的「利息」及土地的「地租」計算在社會成本（social cost）之內。社會主義實現之後，資本、土地等非人生產資源（nonhuman productive resources）雖已從資本家和地主手中獲得解放，但數量上有限的問題仍未消失。如要使有限的資源獲得最經濟最大效率的使用而不流於浪費，中央設計機構不能不付與此等資源以適當的「價格」，在使用時必徵收適當的「費用」，即資本須付「利息」，土地須付「地租」。但此種「價格」不爲一種市場價格，而爲一種由中央設計機構所決定的帳面價格（book keeping or accounting price）。土地與資本的價格在賬面上一經決定，再加上生產技術的客觀條件，則勞動可與土地資

本最有效率地結合起來，社會資源的分配不致有所荒廢或虛擲，而且消費貨財的價格因此得到正確的計算，消費者消費行爲可以依照選擇原則得到最大的滿足。

試以土地爲例，今假定在一想像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有甲乙兩勞動者具有同質的勞動，以相等的工作強度用同樣的種子，在沃度不同的兩塊耕地上耕耘，則生產的結果，耕沃土的某甲的收穫自比耕瘠土的某乙爲多。此兩人的勞動既同質，工作強度又相若，則所得的工資應彼此相等。此時，如祇把工資當成唯一的成本，則兩塊地所產的穀物因產量互異而單位價格應彼此不同，沃土的穀物價格低，瘠土的穀物價格高，但在實際上，此兩種價格不同的穀物的品質又並無差異。如要使價格劃一，轉付甲工以更高的工資，則又失去「等勞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human efforts）的意旨。唯一的妥善方法，是由中央設計機構，在計算穀物的成本時，除了工資之外，還須計算土地的價格，肥沃的土地價格高，貧瘠的土地價格低，則穀物的價格都向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看齊，而勞動者也獲得均等的報酬。但穀物的總價因加上土地「成本」的結果必遠較勞動者所得的總收入爲高，勞動者的購買力將不足換取穀物，中央設計機構再將此兩數的差額，亦即是土地的「地租」，用總額社會紅利（lump-sum social dividend）的方式分給勞動者。其結果，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下，土地的「地租」依然存在，但不屬諸不勞而獲的地主階級，而屬諸出汗出力的勤勞大眾；不是不公平的財產所得，而是由大家平分的社會紅利；不是由私人競爭而形成的市場價格，而是由中央設計機構所決定的帳面符號。此種「地租」取之於勞動者，仍還之於勞動者，但此「轉帳」的方式並非會計上的魔術，反之，能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價格機構圓滿形成，同質同強度的勞動報酬相等，社會主義的理想得以順利實現。

四 在今日而言經濟革命，我覺得至少有兩個重要觀念必需澄清。

第一，經濟革命的崇高理想是「均富」而不是「均貧」。在短期之內，「均」可以作爲革命行動的口號，但在長遠的將來，「均貧」決不能滿足人民當初的希望。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下，榨取性的生產關係，不公道的分配方式，造成貧富懸殊福利不均的現象，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罪惡，消滅此種罪惡，正是革命行動的目標所在。但革命決不應消滅資本，毀滅資源，捨去技術，而只留下一羣赤貧徒手的勞動人民，使社會生產力低沉衰落，社會物質幸福的水準倒退幾百年。資本土地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資本家與地主階級。資本土地爲生產行爲所不可缺少，它們的量與質的增加也正是提高社會生產力的要件。制度有罪，爲制度所支配的客體的本身却并無過失。蘇聯的五年計劃目標何在？蘇聯人民在新經濟政策時代節衣縮食所爲何來？還不是痛感社會生產力的薄弱，社會資本的不充足，而在那裏節省消費從事社會資本的積蓄以建設更迂迴性的大規模的生產方式！人的剝削關係要完全剷除，物的寶貴價值要小心珍惜，這個經濟革命原則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尤其值得重視。我們應還記得，「雙手萬能論」一時曾爲極端頑固份子所倡導，以「均富」爲革命目的的革命者不能不對此有所警惕。

在觀察五卷五期上，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傳統的經濟學說何以竟成了中國的絆脚石？」我預料着這篇短文發表後，必然會引起許多的補充和反駁。果然，在觀察五卷七期上便有翁詠慶先生一個駁論，題為「生產要素四分法合理乎？」此外還接到幾位青年朋友們的來件，有的是給我補充的，有的是向我質疑的，有的是借着討論這個題目的機會，發表他個人，在新社會到來以後，所試擬的工資、地租、和利潤的政策的。我對這些先生們的意見，本應分別的答覆和請教。但一來呢，因為自政府金圓券政策實現以來，越發的貧困、忙迫和煩惱，雖欲分別置答而力有所不支。再來呢，因為這些先生們所提出的問題，也許還是一般的或多數的讀者所共同感觸到的問題。不過他們喜歡把他們說出來，而後者不喜歡或不能夠就是了。

在這些先生們的意見中，楊詩浩先生以為，依據一般銀行家們的見解，放利的資本家，以其儲蓄化為資本取得利息，似乎是合理的。詩浩先生是在銀行作事的。他的意見大約是指一般貨幣資本家們對於銀行利息的一般的看法。依據這種看法，利息可以誘致資本的供給或儲蓄。假如沒有利息，儲蓄勢必減少，消費勢必增加，結果生產的資本勢必減少，同時勞動的生產物，因為缺乏資本的幫助，勢必也要減少，這豈不是很害麼？反過來說，就是利息的存在，因為可以誘至儲蓄或資本的供給，似乎是合理的。但我以為即令利息為零，但資本的供給，仍是可以源源而來的。試設一例以明之。假令在經濟衰敗的時候，社會上有強制失業的現象存在，或有相當廣大的勞動後備軍，又如此時現存的資本亦有剩餘的生產力。為解救經濟的蕭條起見，銀行採取無利的放款政策，而以膨脹通貨的方法，向工商業者為無利的貨幣資本的供給。工商業者於是

關於傳統經濟學的總答辯

樊 弘

以此貸款僱入失業的工人與原料，充分的利用現存資本的剩餘生產力，生產出嶄新的或淨餘的資本或生產的手段出來，資本的供給可能立即隨之增多。這豈不是說，資本的供給縱令利息為零，亦可以為龐大的增加麼？

無利，資本的供給亦然可以增加。有利，資本的供給也許會減少。這個道理極易了解。任何一個資本家在增加投資的時候，他首先考慮的，就是在他投資之後，於其所得之中，除了成本之外，所餘毛利是否夠付利息。現在假令利息為零，則是所餘毛利悉為純利，當然他便要增加投資了。結果生產的資本豈不是便有增加麼？設令利息增加，所餘毛利尚不足以付利息，投資勢將減少，結果資本的供給當然亦減少了。這豈不是很明白的事情麼？

無利既然資本亦可增加，有利資本反而還要減少，足見利息不是誘致資本供給的必要條件了。何況今日放利生息之人，皆為不勞而獲之輩。以言享受，高激雲霄，以言勞動，等於烏有。這還不是剝削是什麼呢？剝削既可減少生產又可破壞正義，莫怪社會主義者要說利息是不合理的了。但我的答覆很簡陋，恐怕不能令人太滿意。

現在我要回到翁詠慶先生在觀察五卷七期上所提出的問題了。翁先生以為傳統經濟學上的四分法仍然是合理的。他的理由是，利息係以酬報儲蓄勞動之物和利潤係以酬報經營勞動之物，所以利息與利潤均是合理的。我以為，在「管理」與「所有」尚未分離之前，利潤尚可解為經營的報酬。因為經營大半都係由經理擔任，不由剪票取息的報酬了。因為經營者的全果了。設使勞動者階級一旦取得了政權，把法律的製造逐漸掌握在勞動者自己的手中澈底改變所有的關係，把主要生產的手段由私有化為公有。試問社會上還有什麼太懶的人可以得到了不得的利潤的事情存在呢？

資本與利潤根本是由勞動創造出來的，而且又為勞動者所有，只因法律不為勞動者所有，即在法律的關係上，資本屬於非勞動的階級。因此，勞動者的階級便不得享受他們的勞動的全果了。設使勞動者階級一旦取得了政權，把法律的製造逐漸掌握在勞動者自己的手中澈底改變所有的關係，把主要生產的手段由私有化為公有。試問社會上還有什麼太懶的人可以得到了不得的利潤的事情存在呢？

現在有許多的經濟學家都以為資本是由儲蓄而來，實則不然。資本完全是由勞動創造而來。勞動創造資本，但不能所有資本。資本家雖不創資本，但能所有資本。千人創造，一人佔有。不幸這些「余一人」的獨佔家，反欲抹殺了千人創造資本的功勞，說資本非由千億萬人的血汗創造而來，乃係由「余一人」的佔有儲蓄而來，並以他的佔

資本和管理，都被當作生產要件，對生產各自發揮最大的生產力，而生產的所得却只歸諸出汗出力的勤勞大眾。要生產力高，不能只憑「胼手胝足」，而必靠「資本化的生產方式」的建立；要分配額平均，須根絕所有權的觀念，而必賴對現存經濟制度革命的成功。生產力龐大，分配額公允，這才是人類最高經濟理想的實現。

知他們的對華觀點，以及在下年度議會中可能通過的任何擴大援助計劃。上列四點，與記者意思，是大體相符合的。杜魯門這次的當選意外勝利和他宣佈將繼承故羅斯福新政的傳統大有關係，而參衆兩院的議席和州長改選後的位置除南方四州外，都是民主黨佔了勝利共和黨死硬派的優勢，而且這些新議員和新州長恰巧又多半是新時期新政派的舊雨，杜魯門說是進一步「援華」的事要等新國會開議時決定，顯然是與中國政府的求援，背道而馳。此外，馬歇爾的手法和設計也是對中國的政府不會有利。如果說中國元首為應急變以求一援，這萬里長城無異於郵誤或原諒，矢本主義的民主國，無論之或左或右，只要是在紙的論調，摘要的列舉人誌的資料與評論，中國人大半是不容易看到的。

「反共」予以相當的支
持的，然而現在的調
都轉了一個九十度的大
轉子。
首先，首先是美國廣播公
司記者福爾斯特七日自
東京廣播稱：中國政府
業經提議，如美國保證
能保衛上海，則將宣佈
上海為國際城市。又謂
中國政府業將此項提議
交與美西太海軍司令會
白吉爾，聞已請白氏轉
達華盛頓矣。福氏並稱
駕該處，以為萬一，二
旦上海宣佈為國際城市
時得以保衛之。這消息
雖似與「美援」的難求
無關，但可以看出當局
應變的「苦心孤詣」，
和外人對中國戰局的不
得以保衛之。這消息
超然派保守份子主導的
英國兩家最有力量的星
期報，今日皆以《直刊》文
載出於中國局勢之論文。
觀察者葛翰為文稱：中共在中國東北
之勝利，乃最其嚴重性
之歷史事件。無人不信
整個中國北部以迄於長江
江岸短期內皆將為共
軍所有。因此在遠東之
心臟地區，行將成立一
擁有二萬萬人口以上之
「共產主義國家」。葛
琳認為國軍之失敗，乃
中國政府之愚蠢與腐敗
管理有以致之。並斥
責稱：在戰事未開始前
，東北即已為湧赴關外

之國民黨投機政客所手失；此輩官僚政客之錯敗統治與剥削，卒驅東北人民投入共軍行列。同日，星期泰晤士報專欄作家史格魯特達氏爲文批評中國政府之貥無能及其在對共軍作戰中之失策處，史氏爲著名之「反蘇反共」政論家，其立論恐猶爲對南京政府之善意的批判。該報又發表其駐北平特派員之來電稱：如美英繼續援助南京政府進行作戰，則美國人之在中國將最爲中國人所厭惡等語。紐約八日電：明星報軍事分析家衛納今日稱：東北之失守，對於南京政府具有決定性之意義。彼認爲蔣總統最近之損失已使中共軍力與國軍之比例變爲三比一，而中共全部戰鬥力與國軍之對比可能爲五比一。衛納原爲細約下午報軍事與政治論家，渠認爲國共力量之比例，如此，國軍欲禦共軍進攻殊難成功，因若無軍隊，亦即無抵抗，其結論是：蔣總統已失去中國與美國。衛納復批評國軍依賴大城市與鐵道之戰略，可見當年日本佔領中國之情形相比。衛納復引用保守黨之倫敦經濟學者雜誌的言論，謂國民黨區域活動的大學生與一切政治活動之青年學者，百分之一十五至百分之十九均已同情中共。同日倫敦電：此間倫敦泰晤士報

評論中國之局勢稱：「中共今日之所以得勢，並非由於其本身有許多長處，而係由於其敵之有甚多錯誤使然。」繼謂：中共佔領東北之後，已獲得擁有巨量經濟資源之基地。彼等進而更能向華北與華中方面的數大據點進攻，該理論對現在時局轉變而搜尋歷史上之前例，頗示南方將再度被北方「征服」；若共軍打通華北與華中之後，而若能決心南進，則國民政府將益受強烈之壓迫，即令「美援」能大量增加，國軍亦難於守住主張防線或長江。徐淮之戰揭幕後，當徐東血戰正酣，黃兵團被圍時，紐約兩家日報於十一日撰論：力主美國撤退其全部駐華人員，蓋因彼時傳聞共軍已自北方西方西進逼京滬之故。每日新聞報認為中國政府勢力日極微弱，如再支援，似無意義。美國最近仍繼續以大量軍事物資援華，但美國人民輿論是否支持政府此舉，殊堪懷疑。該報認為美國應放棄此種不能完全失敗之政策，減少美國之損失，故不如及速撤離中國。同日，紐約明星報論主筆勒納亦撰文討論中國之情形稱：雅爾達會議之議決案，使蘇聯參加對日戰爭，但由

國政府之失敗，並非蘇聯插足中國之東北，乃因國民政府本身之動份子不予以人民的續、土地、生活之信心。勒納認爲與中共作戰，犧牲百十億美金及軍人，以及千百萬名技術人員；以此，勒納主張，應任中國自己進行其內戰。此外，對於中國當局最近向美國之求援，對於南京方面一度盛傳宣戰，英美報紙的論調大同小異。美報紙的論調謂：中國要求美國增加援助，實使杜魯門陷於窘境。論謂：杜魯門究能有甚麼耐人尋味。倫敦泰晤士報於廿日著論稱：中國政府？何況繼續援助此等政府？其措施，更將浪費與迄今猶未能適當運用。對西歐國家之援助？杜魯門必須詢問南京政府，是否具有政策使中國人民團結，具有建設性而替代共產主義，中華人民團體，各報編輯認爲「公州大捷」爲南京政府「公分誇張之宣傳。前鋒

軸自身也須變，將國策作一番天翻地覆的大變，但這樣的一變豈不是等於自己搬石打自己的腳，等於用己的手掌攔自己的臉？中國歷史上，封建時代的英雄領袖，絕少的這樣幹。然而非如此不足以言「應變」。結局，記者在本刊九月號「和一人民似已向通信的『政局報告』」，會客歡的作一觀察新陳代謝地一場遞嬗判斷，指出「人心已變」「和一人民似已向的方向看齊」自信那僅是一種率直之言，是根據那縱的時間和空間所作的一種全性整齊性的判斷。因此，記者所謂「不得不變」，正是滲透上述的兩個方面，也等於說：「我們要變，他們也要變，中國歷史的神也在說，我一定變，你變得好，算你一種變。自身死也不變，徒看着人家變，那是得變」的地步了。

華北山雨欲來

季明

不設防的都

「爲」是「不爲」呢？

市

這並不是說共軍將捨北平而不取，北平畢竟具

有重大的政治性，共軍拿後，小則召開「政協」，成立「人民政權

更不能合作。所謂總體戰，成爲「剿總」的一轄不變，然後以林偉儂

（現已退駐古北口），董其武，孫渡所

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

撤出城垣），石覺部

守承德（現已退駐古

北口），劉玉章增援唐山，孫

蘭皋游弋察綏，鄂友三

馳騁於平津保之間。傅

氏本人則以主帥地位，

坐鎮北平。惟上述軍事

部署，並非一成不變，

必要時南北互調，東西

對抗，也極可能。

昔諸葛亮擺下八陣

圖，卒能阻陸遜追兵，

呼應，也極可能。

「聽天命」了。

作裏擺下七陣圖，是否

能穩定華北，挽回頹勢

，那就得「盡人事」以

「聽天命」了。

東北「解甲」後，共方

為何改編降軍，調整內

部，照理應有一段時期

休息。加以陳劉在華東

發動徐州會戰。勝負之

數，尙未可知。幸而勝

，則華北如在囊中；不

幸而敗，則華北一戰，

尙可捲土重來。蓋共軍

五虎將中，彭德懷善「

養兵」，聶榮臻善「練

兵」，劉伯承善「調兵」，陳毅善「將兵」，

林彪則除善「用兵」外

。

但東北易手後，情形

就逐漸不同了。第一，

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

撤出城垣），石覺部

守承德（現已退駐古

北口），董其武，孫渡所

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

撤出城垣），石覺部

守承德（現已退駐古

北口），劉玉章增援唐山，孫

蘭皋游弋察綏，鄂友三

馳騁於平津保之間。傅

氏本人則以主帥地位，

坐鎮北平。惟上述軍事

部署，並非一成不變，

必要時南北互調，東西

對抗，也極可能。

昔諸葛亮擺下八陣

圖，卒能阻陸遜追兵，

呼應，也極可能。

「聽天命」了。

東北「解甲」後，共方

為何改編降軍，調整內

部，照理應有一段時期

休息。加以陳劉在華東

發動徐州會戰。勝負之

數，尙未可知。幸而勝

，則華北如在囊中；不

幸而敗，則華北一戰，

尙可捲土重來。蓋共軍

五虎將中，彭德懷善「

養兵」，聶榮臻善「練

兵」，劉伯承善「調兵」，陳毅善「將兵」，

林彪則除善「用兵」外

。

但東北易手後，情形

就逐漸不同了。第一，

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

撤出城垣），石覺部

守承德（現已退駐古

北口），董其武，孫渡所

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

撤出城垣），石覺部

守承德（現已退駐古

北口），劉玉章增援唐山，孫

蘭皋游弋察綏，鄂友三

馳騁於平津保之間。傅

氏本人則以主帥地位，

坐鎮北平。惟上述軍事

部署，並非一成不變，

必要時南北互調，東西

對抗，也極可能。

昔諸葛亮擺下八陣

圖，卒能阻陸遜追兵，

呼應，也極可能。

「聽天命」了。

東北「解甲」後，共方

為何改編降軍，調整內

部，照理應有一段時期

休息。加以陳劉在華東

發動徐州會戰。勝負之

數，尙未可知。幸而勝

，則華北如在囊中；不

幸而敗，則華北一戰，

尙可捲土重來。蓋共軍

五虎將中，彭德懷善「

養兵」，聶榮臻善「練

兵」，劉伯承善「調兵」，陳毅善「將兵」，

林彪則除善「用兵」外

。

但東北易手後，情形

就逐漸不同了。第一，

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

撤出城垣），石覺部

守承德（現已退駐古

北口），董其武，孫渡所

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

撤出城垣），石覺部

守承德（現已退駐古

北口），劉玉章增援唐山，孫

蘭皋游弋察綏，鄂友三

馳騁於平津保之間。傅

氏本人則以主帥地位，

坐鎮北平。惟上述軍事

部署，並非一成不變，

必要時南北互調，東西

對抗，也極可能。

昔諸葛亮擺下八陣

圖，卒能阻陸遜追兵，

呼應，也極可能。

「聽天命」了。

東北「解甲」後，共方

為何改編降軍，調整內

部，照理應有一段時期

休息。加以陳劉在華東

發動徐州會戰。勝負之

數，尙未可知。幸而勝

，則華北如在囊中；不

幸而敗，則華北一戰，

尙可捲土重來。蓋共軍

五虎將中，彭德懷善「

養兵」，聶榮臻善「練

兵」，劉伯承善「調兵」，陳毅善「將兵」，

林彪則除善「用兵」外

。

但東北易手後，情形

就逐漸不同了。第一，

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

撤出城垣），石覺部

守承德（現已退駐古

北口），董其武，孫渡所

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

撤出城垣），石覺部

守承德（現已退駐古

北口），劉玉章增援唐山，孫

蘭皋游弋察綏，鄂友三

馳騁於平津保之間。傅

氏本人則以主帥地位，

坐鎮北平。惟上述軍事

部署，並非一成不變，

必要時南北互調，東西

對抗，也極可能。

昔諸葛亮擺下八陣

圖，卒能阻陸遜追兵，

呼應，也極可能。

「聽天命」了。

東北「解甲」後，共方

為何改編降軍，調整內

部，照理應有一段時期

休息。加以陳劉在華東

發動徐州會戰。勝負之

數，尙未可知。幸而勝

，則華北如在囊中；不

幸而敗，則華北一戰，

尙可捲土重來。蓋共軍

五虎將中，彭德懷善「

養兵」，聶榮臻善「練

兵」，劉伯承善「調兵」，陳毅善「將兵」，

林彪則除善「用兵」外

。

但東北易手後，情形

就逐漸不同了。第一，

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

撤出城垣），石覺部

守承德（現已退駐古

北口），董其武，孫渡所

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

撤出城垣），石覺部

守承德（現已退駐古

北口），劉玉章增援唐山，孫

蘭皋游弋察綏，鄂友三

馳騁於平津保之間。傅

氏本人則以主帥地位，

坐鎮北平。惟上述軍事

部署，並非一成不變，

必要時南北互調，東西

對抗，也極可能。

昔諸葛亮擺下八陣

圖，卒能阻陸遜追兵，

呼應，也極可能。

「聽天命」了。

東北「解甲」後，共方

為何改編降軍，調整內

部，照理應有一段時期

休息。加以陳劉在華東

發動徐州會戰。勝負之

數，尙未可知。幸而勝

，則華北如在囊中；不

幸而敗，則華北一戰，

尙可捲土重來。蓋共軍

五虎將中，彭德懷善「

養兵」，聶榮臻善「練

兵」，劉伯承善「調兵」，陳毅善「將兵」，

林彪則除善「用兵」外

。

但東北易手後，情形

就逐漸不同了。第一，

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

撤出城垣），石覺部

守承德（現已退駐古

北口），董其武，孫渡所

溪春部防守保定（現已

撤出城垣），石覺部

守承德（現已退駐古

北口），劉玉章增援唐山，孫

蘭皋游弋察綏，鄂友三

馳騁於平津保之間。傅

氏本人則以主帥地位，

坐鎮北平。惟上述軍事

部署，並非一成不變，

必要時南北互調，東西

對抗，也極可能。

昔諸葛亮擺下八陣

圖，卒能阻陸遜追兵，

呼應，也極可能。

「聽天命」了。

東北「解甲」後，共方

為何改編降軍，調整內

部，照理應有一段時期

休息。加以陳劉在華東

發動徐州會戰。勝負之

數，尙未可知。幸而勝

，則華北如在囊中；不

幸而敗，則華北一戰，

尙可捲土重來。蓋共軍

